

24
西藏文史資料選輯(十四)

增訂題



民族出版社

西藏文史資料選輯

(十四)

牀初題



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京)新登字 154 号

责任编辑:马淑贞

封面设计:王 琮

EA63/33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十四)

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 3/8 字数:140 千字

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2,300 册 定价:3.00 元

ISBN 7-105-01786-4/K·165

(汉 86)

目 录

回忆西藏和谈及其前后	平措旺杰(1)
我参加全国工商联历届会议和 有关活动亲历记	恰巴·格桑旺堆(15)
党的宗教政策落实见闻	贡巴萨·土登吉扎(35)
伟大的成就 可喜的变化	平 措(38)
四十年变迁,那曲地区旧貌换新颜.....	云仲嘎瓦(44)
昌都的变迁	朗 杰(49)
《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是 西藏振兴的起点	桑林·索朗多吉(53)
山南地区的巨变	益西罗布 洛桑彭措 赤列次旺(58)
党的民族政策深入人心	土登甲央(63)
肝胆相照的历程	恰巴·索朗卓玛(68)
怀念爱国人士定甲·多吉坚赞	王 贵(74)
西藏文化事业发展的见证人	胡金安(95)
振奋精神 开拓前进.....	阿沛·仁青(104)
西藏登山运动的回顾与展望.....	贡 布(110)
进军路上驮骡队.....	薛景杰(118)
和平解放西藏的宗教政策.....	黄文焕(127)
西藏畜牧兽医科研的回顾.....	蔡伯凌 索朗旺加(142)
党的光辉普照日光城.....	拉宗卓嘎(161)

毕生献给西藏民族艺术事业·····	土 登(168)
历史不能篡改 成就不可抹煞·····	夏扎·甘登班觉(179)
我在拉萨中学任教期间的见闻·····	强巴旦达(188)
回忆昌都解放·····	鲁发海(192)

回忆西藏和谈及其前后

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平措旺杰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这是中国革命划时代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解放中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势不可挡，所向披靡，解放了全中国绝大部分省、区，包括甘、青、川、康、滇的全部藏区在内，只剩下孤岛台湾和西藏。为了迅速解放西藏，统一祖国大陆领土，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中央人民政府在命令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同时，一再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前来北京谈判，以期和平解放西藏。但是，西藏当局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不仅不听，反而派重兵布防昌都地区，以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在这种局势下，解放军从1950年10月6日起，从数路渡过金沙江，解放了西藏东部昌都地区。

1950年10月19日昌都解放后，成立了以王其梅为书记，我和惠毅然为副书记，陈竞波和夏仲远为委员的中共西藏工委昌都分工委。根据中央和西南局的指示，我们继续大力开展了争取西藏和谈的工作。

在打扎·阿旺松热摄政王退位，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亲政后，西藏“噶厦”政府便决定与中央人民政府举行和谈，并指定在昌都的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还派来了两位僧俗官员，共3

位代表。后又增派了两位僧俗代表,经印度、香港去北京。两路共有 5 位和谈代表。

1951 年 3 月下旬,我奉中央西南局和中共西藏工委的指示,负责陪同西藏和谈代表团到北京。我们一行于 3 月 27 日离开昌都,向北京进发。西藏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是“噶伦”阿沛·阿旺晋美,另外两位代表是“乃仲”土登列门和桑颇·登增顿珠。随行的还有阿沛夫人及金中·坚赞平措等人。当时,川藏公路才修到甘孜,我们一行只得骑着马翻越崇山峻岭,冒着风雪行进。

经过 10 多天的跋涉,抵达原西康省甘孜县城。这里是进军西藏的主力部队即第十八军的军部所在地。我们到达时,受到了军首长和当地党、政及各界代表人士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接待。西藏代表看到这种情景,感到格外的温暖。

从甘孜出发时,西藏工委增派了工委办公室主任乐于泓同志和我一起陪同代表团进京。这时,我们才乘上汽车。

经过康定、雅安、成都到重庆。重庆当时是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央西南局、刘伯承为主席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贺龙为司令员的西南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是主管云、贵、川、康、藏 5 个省区的领导中枢。

一年前,重庆刚解放不久,我接到朱德总司令电报,对我们在西藏等地的地下活动,表示慰问,并令我速到重庆向刘伯承等领导汇报工作。我便由尚待解放的藏区辗转来到重庆,向刘、邓、贺首长当面汇报了我们从 40 年代初期在西藏和其它藏区的革命活动,以及西藏的各方面情况。汇报以后,我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提出了有关和平解放西藏的若干建议。我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在西南局,邓小平同志当面把我介绍给张国华军长后,我和张国华同志一起飞回新津县十八军军部。我担任了进藏南路部队党委副书记,我过去发展的一批巴塘地下党的藏族干部,从此和我一起参加了进军西藏的工作。这样,当我再次来到

重庆的时候,感到格外的亲切。我向西南局的领导同志汇报了当前昌都前线的局势和西藏和谈代表的情况。西南局的领导同志对代表团的到来表示热情的欢迎。邓小平同志亲切地接见并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后,消除了他们的很多顾虑,进一步了解了中央对西藏和平解放的方针、政策。

我们到重庆时,正是阳春4月,人们都身着单衣。但我和乐于泓同志仍穿着在昌都前线时的又厚又脏的羊皮军服。西南军区李达副司令员见我们这般装束,便马上叫人给我们换上了崭新的黄呢军服。

4月20日,我们乘上专机飞往全国各族人民向往的地方——首都北京。我们一行,各自的心情很不一样。西藏和谈代表,思虑着和谈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和谈的结果;而我和乐于泓同志则异常激动和兴奋,因为再过些时候,就要见到想念已久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了,坚信和谈会取得圆满成功。当飞机飞到半途时,接到北京发来的电报,要我们在西安暂作停留,改乘火车前往北京,中央准备在北京车站举行盛大的仪式,欢迎西藏和谈代表团。

在西安机场,前来迎接的有西北民委主任汪锋等。当晚,举行了欢迎宴会,作陪的还有藏族著名学者喜饶嘉措大师。第二天,我们乘专列离开了西安。

4月22日,在北京站,受到了周恩来总理、郭沫若副总理、林伯渠秘书长、李维汉部长等中央领导同志、各界人士以及在北京的藏族同胞和其他兄弟民族代表数百人的热烈欢迎。西藏代表向周总理献了哈达。到首都北京能受到这么隆重的欢迎,他们非常感动,体会到各族人民兄弟般的情谊。

我们下榻在北京饭店。在当时,这是北京最好的饭店,生活安排得非常周到和舒适。

4月26日,经印度、香港来的西藏和谈代表在我国驻印度使馆参赞申健的陪同下,也抵达北京,与我们一起同住北京饭店。他

他们是“马吉”(总司令)凯墨·索郎旺堆和“仲益钦布”(大秘书)土登丹达,以及汉文译员尧西·彭措扎西(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姐夫)、英文译员桑都仁青等。

4月28日,周总理设宴招待了西藏和谈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宴会的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黄炎培,以及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宴会上洋溢着亲切友好的气氛。西藏代表团代表达赖喇嘛向周总理并毛主席献了哈达和礼品。

4月29日,周恩来总理主持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和平谈判的首次会议。周总理首先宣布中央方面的首席代表是李维汉,代表有张经武、张国华和孙志远,并指定我和乐于泓同志列席会议。西藏方面的首席代表是阿沛·阿旺晋美,代表是凯墨·索郎旺堆、土登丹达、土登列门、桑颇·丹增顿珠。接着,周总理就党的民族政策及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作了说明,并恳切地希望中央和西藏的代表,以诚相待,积极努力,使和谈取得圆满的成功,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共同建设新中国。

以后的会议中,双方把有关问题都摆了出来,阐述了各自的看法和意见。中央的首席代表李维汉在历次会议上,反复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即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对我国各民族包括对西藏的侵略和压迫,也坚决反对旧中国历代统治阶级,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深刻阐明了新中国实行的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合作、共同繁荣富强的政策与历代反动统治者实行的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民族歧视、征服、统治、压迫、同化的反动政策之间的本质区别。他根据毛主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号召,强调指出,我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互相帮助,共同建设祖国大家庭,符合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李维汉同志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各族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这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有着本质的区别。总之,实行民族对民族

的统治和压迫是与共产党的原则水火不相容的。

西藏和谈代表团方面,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特别是长期与世隔离,封闭保守,他们对李维汉同志阐明的上述原则和国内外形势,缺乏必要的了解和理解,因而,在说明自己的观点和要求时,与中央的精神和要求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即使个别代表在昌都战役后以及来北京的这段期间,在思想上有新的认识和启发,但作为代表团成员,也得把西藏当局交待的观点和要求在会谈时照样加以阐述。这是和谈初期阶段所面临的基本难题。鉴于这种情况,不论会内会外,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作了多次谈话,尤其是李维汉同志作了耐心的说明。他坦率地指出,由于历代中央政府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因而西藏方面至今保持警戒的态度和各种疑虑,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已经说明了共产党的各项政策,今天的中央人民政府决不会重犯旧中国中央政府的错误。这点,在今后的岁月中,实践会证明的。经过中央代表的多次诚恳谈话后,西藏代表对中央的精神逐渐有所领会,改变了原先的看法,没有坚持那些不切实际的意见。

尽管如此,在涉及具体条文时,还是有过反复争论。在解放军进驻西藏的问题上,西藏当局很有顾虑,提出了一些要求。中央方面作了解释,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捍卫各族人民利益的子弟兵,进军西藏是为了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巩固国防,这与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历代封建专制主义的征服者的军队有着本质的区别。经过说服,逐步消除了他们的顾虑。

其次,西藏方面认为“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与“西藏现行各种制度概不变更”两条之间,互相矛盾,提出疑问。中央方面作了说明:“有关西藏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人民提出要求时,与领导人员协商解决。”

再次,争论比较激烈的是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的地位,以及西藏“噶厦”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的关系问题。根据历史和现状,李

维汉和孙志远同志阐述了对这个问题的原则态度，即决不会像历代统治者那样利用西藏内部政教领袖之间的矛盾来达到自己的统治目的。说明恢复班禅大师的地位和职权是指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与第九世班禅大师和好时候的地位和职权。此外，合情合理地明确了达赖喇嘛为正、班禅大师为副的政治地位。经过反复说明和解释，西藏方面的顾虑基本上得到消除。但是在成立西藏军政委员会问题上，发生了极大的分歧。虽然李维汉同志事前就这个问题同阿沛首席代表交谈过，但在会上，西藏其他代表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他们认为这是等于“在西藏政府脖子上又骑上了一个人”。因这个问题，和谈差点破裂。我看到问题的起因和误解的症结后，十分着急，便分别给西藏代表做了许多针对性的解释工作，并举例说明，不仅在西藏，全国其他各省区也都有过渡性的军政委员会。但他们的疑虑仍无法打消。最后，我说，如果认为西藏军政委员会是“骑在西藏政府脖子上的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不是别人，而是西藏政府的领袖达赖喇嘛。李维汉部长已明确说过，中央将指定由达赖喇嘛担任该委员会主席，班禅大师和张国华任副主席。我反问对此事反感最大的凯墨·索郎旺堆和土登丹达：“难道一个人自己可以骑在自己脖子上吗？”经过会外耐心细致的解释后，他们终于弄清了西藏军政委员会的地位、性质及职权。

由于面临复杂的各种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干预而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有些问题，事实上无法在电报上用三言两语解释清楚。加之通讯联系的局限，西藏代表团不可能事事及时向“噶厦”政府请示。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为了对历史负责，作为和谈的全权代表，只好履行自己的权力，作出必要的决定，包括协议的附件在内。

总之，解放西藏，统一祖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也是中央的既定方针。在这个基本前提下，能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对中央尤其对西藏都有很大好处。认识并能理解这点，至关重要。解决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不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态度及其表现，因为当时革命的

历史进程已经到了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上。因此,西藏代表中,即使个别保守的人,在事实面前,在和谈谈到一定程度时,也就顾大局、识时务了。

整个和平谈判,经过了会内、外反复磋商,甚至有时是激烈的争论。当然,这是毫不奇怪的,毕竟是祖国大家庭内部的事情,大家以诚相见,推心置腹,取得了共识。最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

5月23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庄严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签字仪式。由中央人民政府朱德、李济深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主持(周总理因身体欠佳,由陈云副总理代行),参加仪式的有董必武、彭真、黄炎培、陈叔通、聂荣臻、乌兰夫、傅作义、龙云、赛福鼎、刘格平、马叙伦、许德珩、朱学范等有关领导同志。我和乐于泓同志作为会谈列席人员也参加了签字仪式。中央和西藏代表分别签字后,李维汉和阿沛两位首席代表致词,然后,朱德副主席讲话。签字仪式毕,举行了有数百人参加的庆祝和谈成功的盛大酒会。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日子。从此,西藏人民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而回到了祖国大家庭,西藏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由于我在李维汉同志的领导和支持下,为和谈作了一些工作,在庆祝协议签定的酒会上,李维汉同志特意举杯说我作了“重要贡献”,给予鼓励。凯墨·索郎旺堆是西藏和谈代表团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不仅是当时藏军的总司令,而且是西藏“噶厦”政府中最有实权的大臣索康的叔父。他也在酒会上举杯对我说:“两年前,我们噶厦政府把你赶出了西藏,但是你在这次和谈中的真诚态度和良好表现,消除了我们原先对你的疑虑。的确,我们亲眼看到你为藏汉和好尽了最大努力……”。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毛主席派中央办公厅童小鹏同志给我送了一本《实践论》,封面上,主席以他刚劲有力的毛笔字题写了“平措旺杰同志 毛泽东”。这份难得的手迹,我视为最宝贵的纪念品,一直珍贵地保存着。

5月24日晚，毛主席出席了在怀仁堂举行的庆祝和平解放西藏的盛大宴会。在宴会前，我和乐于泓同志在怀仁堂院内突然遇见了盼望已久的毛主席。我俩急步上前，乐于泓同志立刻行了一个军礼，并向毛主席介绍了我。毛主席紧紧握着我的手，微笑着说：“啊，平措旺杰同志！我知道你……。”然后亲切地拍着我的肩头说：“年轻人长得很健壮嘛！”

在宴会上，毛主席、班禅大师、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郎旺堆、陈叔通、李维汉、马寅初和我都在第一桌，使我有机会第一次聆听毛主席的言谈。席间，毛主席神采奕奕、谈笑风生，显得特别高兴。他兴致勃勃地讲到，中国历史上有个常胜将军薛仁贵被吐蕃军队打败的经过，还说吐蕃的军队两次攻入长安，说明藏族是一个伟大而强悍的民族。

毛主席致词时说，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尤其是汉族和藏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藏族内部也是不团结的。这是历代反动派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造成的。现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力量、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的力量、班禅大师领导的力量都团结起来了，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团结起来，共同建设祖国大家庭、建设新西藏。然后，毛主席端起酒杯说：“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干杯！”全场在热烈的掌声中，相互敬酒祝贺。席间，我也向毛主席敬酒，主席亲切地说：“你们长期为解放藏族人民而奔波，辛苦了。”

那天，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首长以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约200多人出席了宴会，气氛非常融洽，体现了中央对西藏的亲切关怀。西藏和谈代表也深深感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在整个和谈过程中，虽然中央和西藏双方都有各自的翻译人员，但由于当时的具体情况需要掌握好中央的政策精神，并相应地对有关问题能及时作些必要的解答等原因，周总理和李维汉同志

要我来做重要会议的翻译和解释工作。我除了要参加中央代表团的有关会议外,还要在会外给西藏代表作疏通情况、解释疑难、翻译各种政治词汇的含义等具体工作。此外,每天还要去李维汉同志处汇报工作,经常忙到深夜。

李维汉同志在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夜以继日,认真、细致、负责地做了大量的工作。我经常夜间去他的办公室汇报当天的情况,有时谈到凌晨1时许。他每次都细心倾听,并作具体指示。在和谈的最后阶段,当《十七条协议》译成藏文时,李维汉同志一字一句念,让我初译成藏文后,请来了中央民委参事室的同志再一同审核,然后请西藏代表团认真修改译文。为了确保文件的质量,他又让我从藏文译成汉文,逐字逐句讲给他听。仅“人民”一词,他曾召集有关人士反复推敲,从几个不同的译词中,最后才定下同意我译的“米玛”一词。他的那种废寝忘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因成立西藏军政委员会而产生的和谈危机得到消除后,我去政务院向李维汉同志汇报时,他非常高兴,当即拿起桌上的电话报告了毛主席:“主席,我是罗迈。平措旺杰同志来了,他说明天可以恢复和谈……。”夜深人静,我在他身边清晰地第一次听到带着浓重的湖南乡音的毛主席的声音,也才知道原来他就是罗迈啊。和谈期间,我和李维汉同志朝夕相见,悉心交谈,深深感到他是一位有真才实学,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领导同志,是位严师益友。他很直率,他的性格像我们东部藏区的康巴人。和谈取得成功,与李维汉同志的极大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为此倾注了巨大心血。这些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和谈签字后,中央决定派张经武同志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的全权代表。张代表等人于6月13日乘飞机离京,途经印度去西藏。随行的有乐于泓主任及彭哲同志等。凯墨等和谈代表也与张代表一起由原路回藏。7月14日,张经武代表抵达中印边界我

国重镇亚东，会见了达赖喇嘛，面交了毛主席的亲笔信和《十七条协议》的副本。于是，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全体官员在8月17日由亚东返回拉萨。

6月2日，我陪同阿沛等代表离京返藏。我们到重庆那天，数十万群众燃放鞭炮，挥动彩花，热烈欢迎和谈代表。邓小平等领导同志亲自到郊外迎接。我们在重庆逗留期间，邓小平同志会见了代表团。然后，我们经成都、康定、甘孜，回到昌都。回到昌都时，受到党政军及数百名僧俗群众的热烈欢迎。

我们返回昌都后，着手准备进军拉萨的工作。以张国华为司令员、谭冠三为政委的十八军总部也由甘孜转到了昌都，组织了进军拉萨的先遣部队，成立了以王其梅同志为书记，我和林亮、徐淡庐、陈竞波、罗家镐为委员的中共拉萨先遣部队党委会。军党委任命我为民运部部长。

7月25日，先遣部队离开昌都向拉萨出发，阿沛等代表也和我们一起出发。从昌都到拉萨的进军路上，条件很艰苦，要翻越五、六千公尺高的东雪山与西雪山，不仅要克服自然条件差的困难，还要解决一些意想不到的复杂问题。我们还向沿途的藏族群众做工作，使他们了解和支持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解放军。

1951年9月8日，我们到达蔡公堂村时，终于遥望到了布达拉宫上闪闪发光的金顶。我告诉王其梅等同志：“我们到拉萨了。”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非常兴奋。我们到达拉萨河边，用牛皮筏渡过了大河。过河后就在河滩上宿营，休整两天，准备进城和拉萨人民见面。

“噶厦”政府派了几名僧俗官员前来河滩表示欢迎。张经武同志也派了乐于泓同志迎接我们。

阿沛一行，未能与我们一起过河，在河南的“鲜喀庄园”停留了3天。他在北京，自己剪掉了辫子，“噶厦”政府不满，令他按照规矩编结贵族官员的发型，与其他大臣衣着一样，才能来拉萨，拜见达

赖喇嘛，正式报到。

第二天早上，我们从河边向拉萨进发。大家都穿上整洁的军装，背着背包、粮食，扛着擦亮的武器。进入市区前，西藏当局派绕噶厦和夏苏二大臣在路旁草场上设帐篷欢迎。我们几位负责同志进帐篷互献哈达，坐了片刻后就进城了。部队由五星红旗作先导，横幅和彩旗队的后边，抬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巨幅画像，接着是数十名文艺工作者组成的军乐队和腰鼓队。精锐的先遣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唱着军歌在市区行进。王其梅同志和我等走在队伍前面。

由郊区到市区途中，拥挤的群众站在道路两边迎接和观看从未见到过的人民解放军。当进入拉萨市“八郎学”赤门公馆前时，看见先期到达拉萨的中央代表张经武等站在楼房上，我们相互亲切地举手致意。按原定计划，我们绕人山人海的拉萨市八廓街一圈，然后到“马噶莎巴”即新兵营住宿。

先遣部队的入城仪式，自始至终都在庄严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在拉萨各界群众的心目中，留下了亲切友好的印象。

新兵营是西藏当局事先给我们安排的住宿地。“噶厦”政府派凯墨·索郎旺堆和柳夏·土登塔巴两人负责接待先遣部队。我们到达拉萨初期，一切工作都要和他们联系，才能办理。

首次抵达拉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先遣部队及其党委会，在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张经武同志的领导下，根据毛主席的“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的指示精神，主动、积极地首先向西藏上层及各界代表人士开展统战工作，宣传《十七条协议》、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以及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王其梅同志和我以及有关同志带着哈达、礼品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像片，访问了两位“司曹”（代理摄政王）、八位正副“噶伦”（大臣）、四位“仲益钦布”（大秘书）、四位“仔本”（财政官）、“扎萨”、“台吉”，以及重要的四品

官员和三大寺、四大林的活佛“堪布”(僧官),还有已退位的摄政王打扎活佛等。初步与持各种政治见解和态度的上层及各界代表人士见了面,谈了话。我们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社会力量,为建立一个广泛的反帝爱国、拥护协议的统一战线,开始进行工作。

1951年9月24日至26日,“噶厦”政府召开了有全体僧俗官员及三大寺代表出席的“春堆舍堆杰巴”(机要扩大会议)。由阿沛·阿旺晋美等5位和谈代表向大会汇报了签定《十七条协议》的经过。出示协议正本并向大会郑重声明:“我们五人愿以身家性命和财产保证,协议对达赖喇嘛的宏业、西藏的政教、全藏黎民的利益都有好处,如果大会证明协议对上述种种不利,则请惩办我们……”。经大会讨论,通过了报达赖喇嘛的呈文:“签定十七条协议对于达赖喇嘛之宏业、西藏之佛法、政治经济诸方面,大有裨益,理当遵照执行。”根据西藏地方政府的旧例旧规,达赖喇嘛的权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享有最高最后的定夺主宰之大权。10月24日,达赖喇嘛致电毛主席,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毛主席回电嘉勉。

10月26日,进军西藏的主力部队抵拉萨,在拉萨东郊设立了阅兵台,举行了庄严的阅兵仪式,检阅了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和西藏地方部队。在阅兵台上有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军首长张国华、谭冠三、王其梅、李觉、刘振国和我;西藏地方政府有首席噶伦(大臣)然巴·土登贡钦、噶伦索康·旺青格勒、拉鲁·次旺多吉、朵噶·彭措绕杰、阿沛·阿旺晋美等大臣,还有“噶曹”(代理大臣)夏索·居勉多吉、东布娃·钦绕旺秋、噶章·罗桑仁增,以及藏军总司令凯墨·索郎旺堆等。道路两旁站满了围观的群众。受阅部队整齐、庄严,纪律严明,盛况空前,给拉萨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2月1日,以范明同志为首的西北独立支队也到达拉萨。西藏地方政府派了官员到郊区迎接。我和乐于泓、徐淡庐、陈竞波等